



การศึกษา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าฏศิลป์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อีสานในมณฑลยูนนานภายใต้มิติทัศนสัญลักษณ์ทางร่างกาย

จางรู่ชู่*, กนกพร นุ่มทอง**, เกวลี เพชรชาติพิย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ภาควิชาภาษาตะวันออก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กษตรศาสตร์

อีเมล : zhang.r@ku.th, kanokporn.n@ku.th, fhumklp@ku.ac.th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4 มีนาคม 2569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21 เมษายน 2569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22 เมษายน 2569

บทคัดย่อ : ระเบียบ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อีสาน ทำหน้าที่เป็นสื่อกลางที่มีชีวิต ในการหลอมรว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บริเวณชายแดน ตะวันตกเฉียงใต้เข้าไว้ด้วยกัน โดยใช้ ‘ร่างกาย’ 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มือในการถอดรหัส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าง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การลงมือปฏิบัติ ทั้งในด้านการปฏิสัมพันธ์ 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 และการหลอมรวมระหว่าง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 ให้กลายเป็นท่วงท่า การจัดแถว และ พิธีกรรมเชิงประจักษ์ บทความนี้ใช้กรอบทฤษฎีสัญศาสตร์ทางกาย (Body Semiotics) และทฤษฎี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ผ่านภาพลักษณ์ ทางนาฏศิลป์ (Dance Imagery Narrative Theory) โดยคัดเลือก “ระบำกล่องยาสูบ” (Cigarette Box Dance) “อาซึ่เทียวยั่ว” (Axi Moon Dance) และ “ระบำเท้าซ้าย” (Left-Foot Dance) เป็นกรณีศึกษาหลัก 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ลงพื้นที่ภาคสนามใน แถบยูนนานตอนกลางและตอนใต้ เพื่อวิเคราะห์ว่าสัญลักษณ์ทางกายในระบำ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อีสานนั้น สามารถบรรจุ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 ใน 3 ระดับได้อย่างไร ได้แก่ การจัดระเบียบพื้นที่ในการปฏิสัมพันธ์ การแปล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ท่วงท่าใน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 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สร้างอัตลักษณ์ใหม่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หลอมรวม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พบว่า ระเบียบ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อีสานได้สร้าง แนวทางปฏิบัติผ่าน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างกาย โดยอาศัยไวยากรณ์เชิงพื้นที่แบบ “ร่วมวงระบำ” การหลอมรวมชุดคำศัพท์ทาง นาฏศิลป์ผ่าน “ท่วงท่าที่สอดประสาน” และการรังสรรค์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หม่ผ่าน “การมีส่วนร่วมในพิธีกรรม” 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นี้ ไม่เพียงแต่จะช่วยธำรงไว้ซึ่ง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กลุ่มย่อยต่าง ๆ ในชาติพันธุ์ แต่ยังช่วยปลูกฝังและต่อยอด สำนึกร่วมแห่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นให้แน่นแฟ้นผ่านการใช้ “ร่างกายเป็นตัวนำ” ถือเป็นการวางบรรทัดฐานทางทฤษฎีและให้ บทเรียนเชิงปฏิบัติในมิติด้านร่างกาย สำหรับการสืบทอด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ข้า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นเขตพื้นที่พหุชาติพันธุ์

คำสำคัญ : สัญลักษณ์ทางกาย ระเบียบ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อีสาน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 สำนึกร่วมแห่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น

* First Author

E-mail address: zhang.r@ku.th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kanokporn.n@ku.th

A Narrative Study of Yi Dance in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ily Semiotics

Zhang Ruishu, Kewalee Petcharathip, Kanokporn Numtong

Chinese Section, Eastern Languages Depart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zhang.r@ku.th, kanokporn.n@ku.th, fhumklp@ku.ac.th

Received: 4th March 2026

Revised: 21st April 2026

Accepted: 22nd April 2026

Abstract:

As a living mediu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Yi dance in Yunnan encodes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rocesse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perceptible bodily movements, spatial formations, and ritual performances. Draw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bodily semiotics and dance imagery narra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representative forms—Yanhewu (烟盒舞, Cigarette Box Dance), Axi Tiaoyue (阿细跳月, Axi Moon Dance), and Zuojiawu (左脚舞, Left-Foot Dance)—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conducted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Yunn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bodily symbols in Yi dance construct a three-lay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interaction, the kinetic transl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ritu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Yi dance establishes an embodied pathway of meaning-making through the spatial syntax of “dancing within a shared circle,” the lexical fusion of inter-embedded mo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achieved through ritual sharing. This narrative mechanism not only sustains the internal diversity of Yi sub-ethnic traditions but also, through a “body-first” mode of practic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hared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foregrounding the body as a semiotic medium,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ethnic dance as an embodied narra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multiethnic regions.

Keywords: Bodily semiotics; Yi dance; Narrative studie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ographic fieldwork

身体符号视域下云南彝族舞蹈叙事研究¹

张瑞书，吴琼，李毓贤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

电子邮箱: zhang.r@ku.th, kanokporn.n@ku.th, fhumkpl@ku.ac.th

收稿日期: 2026 年 03 月 04 日 修回日期: 2026 年 04 月 21 日 接受日期: 2026 年 04 月 22 日

摘要: 作为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交融的活态载体，云南彝族舞蹈以身体为媒介，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实践编码为可感知的动作、队形与仪式。本文以身体符号学与舞蹈意象叙事理论为框架，选取烟盒舞、阿细跳月、左脚舞为核心案例，结合滇南、滇中的田野观察，剖析彝族舞蹈身体符号如何完成“交往的空间组织、交流的动作转译、交融的身份重塑”三层叙事。研究发现，彝族舞蹈通过“同圈共舞”的空间句法、“互嵌动作”的语汇融合与“仪式共享”的文化再造，构建了具身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叙事既维系着彝族支系文化的多样性，又在“身体先行”的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承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身体维度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身体符号；彝族舞蹈；叙事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田野观察

¹ 本文是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学系中国学博士研究生张瑞书学位论文《云南彝族舞蹈的“三交”叙事研究》的组成部分，主导师为吴琼教授，副导师为李毓贤助理教授。

引言

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舞蹈作为一种身体实践形式，长期被视为社会表达与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实践系统（孙德朝，2022；冯莉，2021）。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类文化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本之中，还存在于舞蹈、动作等非语言领域——舞蹈作为身体语言，其每一个动作、姿态及空间组织模式均可视为意义的符号单位，承载着文化、情感与社会关系的表达（Langer, 1986；常海齐，2019）。张素琴、刘建（2013）从语言学与符号学角度系统构建了身体语言的理论框架，将舞蹈视为一种具结构性的符号表达形式，强调身体、语汇、风格之间的系统性关系。

同时，Maurice Merleau-Ponty（1945）的身体现象学为舞蹈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其强调身体知觉是与世界交互的根本方式，身体既是感知世界的媒介，也是文化世界意义生成的核心。基于这一视角，舞蹈不再是简单的动作组合，而是包含行动、空间感知与文化结构意义的实践活动。在多民族互动丰富的西南边疆地区，舞蹈作为活态文化表达载体嵌入彝族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空间结构、节律互动及身体互动逻辑不仅体现审美特质，更反映了族群关系的社会结构（龙保贵 5，2023）。

在当代文化治理语境中，民族舞蹈研究亦获得了国家法律与政策层面的重要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将传统舞蹈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强调对传统表演艺术的调查、记录、传承与传播，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民族舞蹈研究与保护的制度基础。同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化非遗资源的当代表达与传播功能。此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应加强传统艺术的学理阐释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在国际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视角，强调包括舞蹈在内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系统性保护与传承。上述法律与政策共同构成了民族舞蹈研究的现实依据与时代背景，也凸显了相关研究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现有彝族舞蹈研究多集中于类型梳理、音乐风格或历史渊源层面，对舞蹈如何通过身体符号实践组织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的深化探讨仍显不足，且缺乏基于田野语境的经验性阐释。

在云南多民族文化格局中，各民族均拥有独具特色的舞蹈传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身体表达谱系。然而，相较于其他民族舞蹈形态，彝族舞蹈在历史连续性、分布广泛性及类型体系完整性方面具有更为突出的代表性。一方面，彝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人口规模较大、支系分布广泛的民族，其舞蹈文化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涵盖祭祀仪式、生产生活、节庆娱乐等多重功能的复合型体系，具有鲜明的社会结构映射意义。另一方面，彝族舞蹈在不同地域与支系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与内部多样性，这种“同源异构”的文化形态为探讨身体符号如何在具体语境中生成与变异提供了理想个案。

基于此，本文在整体考察彝族舞蹈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叙事特征与身体符号代表性的三种彝族舞蹈类型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三类舞蹈分别在仪式性、社会交往性与表演性维度上具有突出的结构特征，既能够体现彝族舞蹈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功能差异，又能够揭示身体动作、空间组织与群体互动之间的符号建构机制。通过对这三种舞蹈类型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以点带面，探讨彝族舞蹈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实现文化意义的编码与传播，从而弥补现有研究中对身体符号实践与社会关系建构关注不足的问题。

研究目的

本文以身体符号学与舞蹈意象叙事理论为分析视角，围绕云南彝族舞蹈的身体实践机制，旨在系统探讨民族舞蹈在多民族社会互动中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义。

1. 从身体空间结构入手，分析彝族舞蹈如何通过队形组织、空间调度与身体互动建构社会交往秩序，揭示舞蹈空间形式所蕴含的交往逻辑及其符号意义。
2. 聚焦舞蹈动作语汇，考察不同支系与文化语境中动作形态的互嵌、共享与变异机制，阐明身体动作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符号传播与意义转译路径。
3. 以仪式实践为核心，探讨集体舞蹈行为如何在节庆与公共文化场域中生成共享经验，分析身体参与在身份认同建构与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4. 通过烟盒舞、阿细跳月与左脚舞三个典型案例，构建“空间—动作—仪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揭示云南彝族舞蹈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具身化叙事结构。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研究将身体符号学引入民族舞蹈研究，从传统的风格描述与民俗功能为主的解释路径，转变为强调舞蹈身体的符号属性与意义生成功能。通过构建“空间—动作—仪式”分析框架，揭示身体实践在文化叙事中的结构作用，并将“交往—交流—交融”界定为具身化过程，为民族舞蹈叙事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分析视角。

在学科层面，本文有助于深化舞蹈学、符号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舞蹈被置于社会互动与文化认同建构机制中加以理解，推动民族舞蹈研究由描述性阐释向机制性解释转向，拓展相关研究的理论维度。

在实践层面，研究有助于理解民族舞蹈在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功能。彝族舞蹈的身体互动、空间结构与仪式参与机制反映了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实践逻辑。对这些机制的阐明，可为民族舞蹈的当代传承与跨文化传播提供具身维度的解释路径。

文献综述

（一）彝族舞蹈

国内对彝族舞蹈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研究主要集中在舞蹈文化本体、仪式象征、动作结构及现代转型等路径。

在舞蹈文化与艺术本体层面，研究多强调舞蹈与民族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普丽春（2001）较早从文化特征角度讨论“阿细跳月”的民族属性，指出其在群体交往与情感表达中的文化功能。曾爽爽（2018）从审美维度分析彝族舞蹈动作的节律结构，认为其动作形态本身具有独立审美价值。高云鹏（2021）与张松（2020）进一步通过凉山地区舞蹈的动律结构分析，揭示舞蹈风格与地域文化生态之间的生成逻辑。

在仪式与宗教象征研究路径中，学界多将舞蹈置于生命礼仪与信仰结构中加以阐释。朴永光（2004）通过对凉山彝族丧事舞蹈的研究指出，舞蹈是维系社会秩序与精神结构的重要仪式行动。代琳娜与杨甫旺（2008）系统讨论祭祀与丧葬舞蹈在信仰体系中的角色。赵倩（2017）则从巫术仪式语境出发，强调舞蹈在文化遗产与精神秩序重建中的意义。

象征与图腾研究拓展了舞蹈的符号学维度。刘晔（2011）通过“火”意象分析，指出舞蹈身体动作与文化象征之间的隐喻关系。杨向东与冯楚吟（2017）以虎舞为例，论证舞蹈动作是族群记忆的身体化呈现。

在动作形态与结构研究方面，张富林（2017）强调舞蹈语汇分析在民族舞蹈学中的基础地位。杨琛（2020）则从音乐结构与身体节律互动关系出发，揭示舞蹈动作组织的内在逻辑。

在现代性语境中，赵明与刘怡（2013）指出凉山彝族舞蹈在舞台化过程中出现意义重构与功能转换。李延浩与崔航（2020）提出“现实简化”概念，认为当代传播中出现符号压缩现象。杨向东与袁凌云（2015）则探讨传统舞蹈在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创新路径。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彝族舞蹈的文化阐释与艺术分析奠定了基础，但多将舞蹈视为文化表征系统，对舞蹈身体如何作为意义生成机制与叙事结构的系统分析仍相对不足，尤其在多民族交往交流语境中的身体实践研究尚待深化。

（二）身体符号

“身体符号”研究兴起于符号学与舞蹈学交叉领域。张素琴与刘建（2013）指出舞蹈身体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非语言符号系统，其意义生成于动作结构关系之中。刘建（2017）进一步强调身体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表征功能。宗明立（2016）与刘旭嘉（2024）从语义组织角度分析身体语言的意义机制。

在舞蹈表意研究中，张嘉烜（2014）认为舞蹈身体语言具有可分析的符号结构，其语义在观演关系中动态生成。杨洋（2025）将身体符号与舞蹈叙事结合，指出身体动作既是审美表达形式，也是文化经验的结构机制。贾佳（2025）强调舞蹈动作的文化编码功能。

在民族舞蹈语境中，孙德朝（2022）提出“身体符号—文化记忆”模型，指出身体实践是族群历史经验的重要建构机制。朱秋涛与田艳（2025）则从仪式雉舞角度论证身体动作的宗教符号属性。李国忠与和春云（2019）通过达巴舞蹈研究揭示身体动作在象征系统中的结构功能。

近年研究引入认知与媒介视角。吴桐（2025）指出身体、器物与场域共同构成意义生成系统。李佳霓（2025）与彭晶（2025）分别从媒介仪式与观演互构角度讨论身体符号的再生产机制。

总体来看，身体符号研究为舞蹈意义机制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但在民族舞蹈具体实践中，身体符号如何组织为叙事结构、如何参与社会互动建构，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

（三）舞蹈叙事

国内舞蹈叙事研究经历了从能力论到机制论的转型。于平（1995）提出舞蹈叙事可通过动作序列实现线性结构表达。白凌（2011）强调舞蹈具有独立叙事潜能，不依赖语言文本。何放舟（2015）进一步指出舞蹈叙事的关键在于结构组织与意象建构。刘炼与刘璐（2014）提出“有意味的形式”，强调叙事是结构化意义生成过程。

在结构机制层面，朱玉红（2020）从创作原则出发讨论叙事逻辑。司志强（2020）强调“戏剧行动”的组织功能。王恺与马璇（2020）以及张素琴（2010）指出空间调度与队形结构在叙事中的意义。

近年来，研究转向身体叙事与意象叙事。何艳珊与杨石磊（2022）指出舞蹈叙事本质上是身体意义生成过程。张晓梅（2023）提出“动觉叙事”概念。于平（2018, 2019）指出舞剧由情节叙事向隐喻叙事转型。顾佩英（2025）进一步强调意象与身体符号系统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媒介与历史叙事成为新议题。张梓轩（2025）指出舞蹈影像拓展叙事维度。满梦翎（2022）认为舞蹈是历史经验的具身表达。许薇与金淼（2024, 2025）讨论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视觉意象建构。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舞台文本与媒介表达，对于民族舞蹈在现实社会交往场域中如何通过身体动作构成叙事结构、如何参与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机制的讨论仍显不足。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构建“田野观察—案例分析—身体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设计，将舞蹈理解为身体实践与文化符号系统的统一体，重点关注身体动作在社会互动与叙事建构中的意义机制。

在研究工具与数据收集方面，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文献资料分析两类方法。研究以烟盒舞、阿细跳月、左脚舞为核心案例，案例选择基于类型差异与文化功能互补性原则：

烟盒舞→技艺型/表演型舞蹈/可流动性强；

阿细跳月→节庆型/身份标识型舞蹈，地域嵌入性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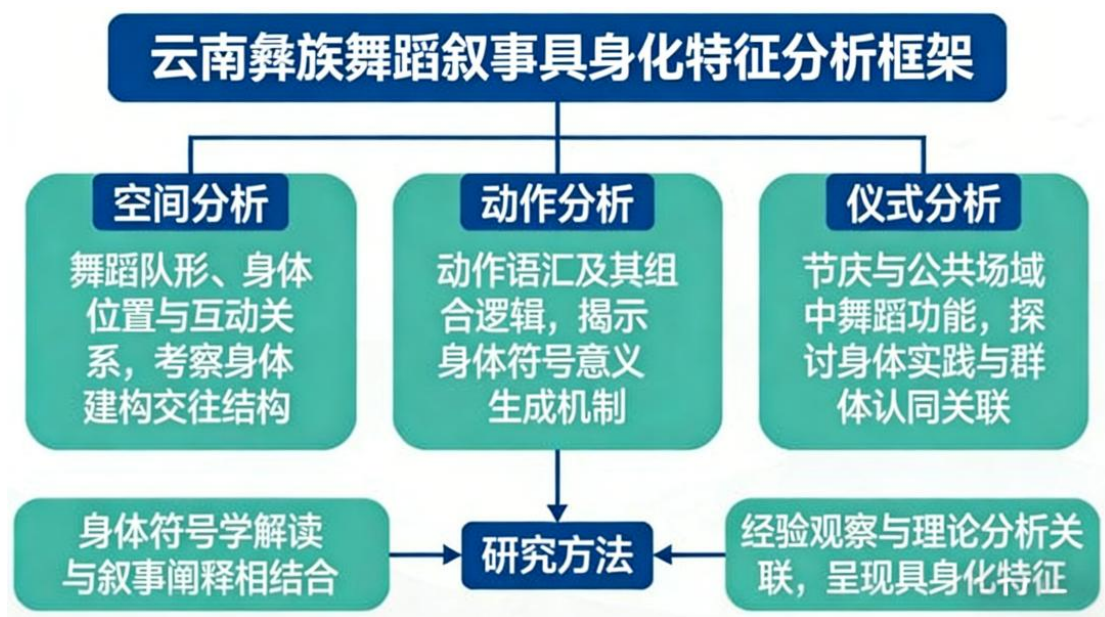
左脚舞→参与型/社会组织型舞蹈，集体结构稳定。

三类舞蹈在动作组织、参与方式与社会语境层面的结构差异，为比较分析舞蹈身体叙事提供了清晰的观察样本。

在资料来源方面，田野观察于2024年4-2025年12月先后在云南建水、石屏、开远、个旧、弥勒、华宁、峨山、易门、元江、新平、砚山、普洱、江城、思茅、宣威、弥勒、泸西、丘北、路南、宜良、陆良以及楚雄市和南华、姚安、大姚、元谋、禄丰等二十多个县市，调研节点覆盖彝族三月会、火把节、端午歌舞会等核心节庆场景。研究通过持续性参与式观察，记录舞蹈现场的身体组织方式、动作结构、队形调度与群体互动模式；同时结合地方文化馆馆藏影像资料、《中华舞蹈志》等地方文献文本，以及民族舞蹈学、人类学相关研究成果，对舞蹈形态、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进行参照性解读，对舞蹈动作与表演结构进行反复比对，确保研究分析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在分析框架上（图1），本文围绕“空间—动作—仪式”三个维度展开。空间分析聚焦舞蹈队形、身体位置与互动关系，考察身体如何建构交往结构；动作分析关注动作语汇及其组合逻辑，揭示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仪式分析则侧重舞蹈在节庆与公共场域中的功能，探讨身体实践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身体符号学解读与叙事阐释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力图在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之间建立关联，以呈现云南彝族舞蹈叙事的具身化特征。

图 1 云南彝族舞蹈叙事具身化特征分析框架



研究结果

基于滇南、滇中多地的田野观察与案例分析，云南彝族舞蹈的身体符号叙事呈现出鲜明的结构分化特征，不同舞蹈形态在身体空间组织、动作语汇结构与仪式参与逻辑层面形成规律性的叙事模式，且与田野场域中的现实实践深度契合。

（一）空间维度：交往的场域建构

彝族舞蹈以“圆圈”为核心空间符号，构建了“无边界、共参与”的交往场域，不同舞蹈的空间形态与交往逻辑呈现差异化特征，且与田野中的地域实践高度关联（见表 1）。

表 1 云南彝族舞蹈的队形、身体位置与互动关系对比

舞蹈类型	舞蹈队形	身体位置	互动关系	空间核心特征
烟盒舞	开放式， 无固定布局， 自由聚合、散开。	灵活多变， 即兴调整。	开放互动，观演边界 模糊，可跨支系、 跨人群参与。	流动式、表演性、 开放互动， 可迁移性强。
阿细跳月	围合式， 圆圈、队列为重， 布局固定。	相对固定，多为 男外女内圈层。	封闭性互动， 聚焦支系内部， 外部人员较少介入。	节庆专属、围合。
左脚舞	集体围圈式， 多层同心圆。	相对固定， 核心圈层与 外围圈层分工。	整合性互动， 覆盖社区全体成员， 强调集体联结。	公共性、整合性、 层级清晰， 社会组织性强。

1. 烟盒舞：《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指出，烟盒舞原称“跳弦”“跳乐”，因以四弦琴伴奏而得名，“烟盒舞”一名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舞蹈工作者依据舞者手持烟盒伴舞的表演特征所命名。

在笔者于云南建水与石屏地区的田野观察中，烟盒舞并不依附于固定舞台，而往往在村寨空地、集市边缘或节庆临时场域中自然展开。舞蹈开始时，三五名舞者往往先以零散站位试探性踏步，随着四弦琴节奏逐渐稳定，周围观众不断靠近并加入队列，原本松散的人群迅速形成半圆或流动环形结构（见图 2）。舞者与观众之间不存在明确边界，观看与参与在实践中持续转换，呈现出典型的“观演共生”状态。

图 2 石屏县烟盒舞的流动式开放空间结构（2025 年 4 月，笔者摄）



这种开放式空间形态与烟盒舞广泛的传播路径密切相关。舞蹈流行于建水、石屏、开远等二十余县市，多数民间艺人认为其源自彝族尼苏支系的自娱性舞蹈，并在跨支系传播过程中被汉族、傣族与哈尼族群体吸收与再实践，近年更转化为城乡群众参与度极高的健身性舞蹈形式。空间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可迁移性与社会开放性：舞者位置不断重组，队形在自由散开与快速聚合之间循环切换，使身体成为连接不同族群与社会关系的移动媒介。

地方志材料亦记录了这一舞蹈的社交属性。《建水县征集通志资料》记载，“跳月，亦名吃火草烟，为建水夷民特殊之风俗”，多为不同村寨青年男女约定聚集共舞，通过唱和与舞动表达情感交流。田野访谈中，多位当地舞者仍将其称为“玩小姑娘”“玩小伙子”，强调舞蹈作为青年交往空间的功能。尽管传统上存在“不准在村内进行”的习俗限制，但新中国成立后，舞蹈逐渐进入公共广场与节庆展演空间，原有禁忌被打破，空间开放性进一步强化。

因此，烟盒舞的空间并非静态表演场，而是一种在移动、聚散与互动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关系场域，其流动性、展示性与开放互动性共同构成了该舞蹈得以跨地域传播的重要机制。

2. 阿细跳月：阿细跳月流传于弥勒、泸西、丘北、路南、宜良、陆良等地，俗称“跳乐”，阿细语称“高斯比”，意为“高兴地跳”，亦称“跳大三弦”；撒尼人称其为“三弦比”，意为“跳三弦”，是彝族支系阿细人与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民间舞蹈（《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205）。

笔者在弥勒地区节庆期间的田野观察中发现，阿细跳月并非随机发生于日常空间，而是明显嵌入节庆场域。当夜幕降临，篝火点燃，三弦声率先响起，人群自发围拢，圆圈逐渐形成。与烟盒舞“聚一散一再聚”的流动结构不同，阿细跳月的队形一旦形成，便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围合状态。男性多处于外圈，女性位于内圈，身体节奏保持相对一致，步伐重复而有韵律，空间边界在身体排列中被不断强化。

据文献记载，其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时期。清末民初的“跳乐”阶段，男女老少同场共舞，男舞者手持小三胡、竹笛、葫芦三弦、树叶、四弦等乐器边奏边舞，其中小三胡起主导与指挥作用（《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这一时期的舞蹈主要发生于春节、火把节等节庆的固定场所，如摔跤场等公共空地，闲暇夜晚青年男女相约亦可起舞，有时通宵达旦。重大节日时参与人数可达数百人，舞圈层层叠叠，远观如同火焰般起伏（见图3）。

图3 弥勒市西三镇民族文化主题街区阿细跳月生活艺术节（2024年8月，笔者摄）



在实际场域中可以清晰感受到，这种围合式队形并非单纯形式安排，而是一种空间记忆的再现。民间传说中“围火起舞”的场景，通过圆圈结构被持续复现。舞蹈过程中，舞者的身体位置相对固定，互动主要发生于阿细与撒尼支系内部成员之间，外来观看者通常停留在外围，较少进入舞圈。与烟盒舞开放进入式的空间机制不同，阿细跳月形成了一种“内聚型”的身体结构。

这种围合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节庆依附性。它既延续了围火追忆祖先、欢庆胜利的象征语境，也通过身体的重复性排列强化族群内部情感联结。在空间层面，舞圈成为族群边界的具身表达一边界并非墙壁，而是由身体构成的流动环形结构。

20 世纪中期，阿细跳月开始突破原有地域空间：1946 年进入昆明演出，1950 年在怀仁堂为国家领导人表演，1954 年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些事件使原本嵌入节庆场域的舞蹈走向国家与国际舞台，其展示空间由“围火圆圈”转向“剧场舞台”。然而，在笔者田野观察中可以看到，即便在当代表演化改编版本中，核心的围合结构仍被保留，节庆语境中的支系专属性并未完全消解，而是在新的展示场域中转化为文化标识。

从空间叙事结构来看，阿细跳月通过稳定围合与节庆嵌入，构建出一种“内向凝聚型”的交往模式。空间不以开放流动为特征，而以情感内聚与族群边界强化为核心，其身体排列方式成为族群身份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3. 左脚舞：左脚舞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并广泛分布于楚雄市及南华、姚安、大姚、元谋、禄丰等周边地区（《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213）。据康熙四十一年（1703 年）修定的《定远县志》记载：“三月二十八日，就城外南郊乐岳宫赶市……至晚，男女百余人嘘葫芦笙，弹月琴，吹口弦，唱夷曲……环围堕左脚，至更余方散。”这一记载表明，至迟在清代，左脚舞已与“三月会”等大型集市活动深度结合。

笔者在牟定“三月会”期间的田野观察中发现，左脚舞往往在庙会主场地中央自然生成。白日的交易声尚未完全散去，葫芦笙与月琴的节奏便逐渐聚拢人群。起初只是十余人围成小圈，随着节奏加强，外围观者开始试探性加入，圆圈迅速扩大。夜色降临后，灯光与火把映照下的舞圈层层递进，远观如同缓慢旋转的涟漪，脚步整齐落地时，夯土广场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回响，与文献中“群起踏踩夯土”的描述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呼应。

与烟盒舞的流动开放结构、阿细跳月的节庆围合结构不同，左脚舞呈现出更为宏大的集体围圈形态（见图 4）。舞者手拉手、搭肩搂腰，身体之间保持持续接触，形成高密度的身体联结网络。圆圈并非单一层面，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核心圈层多为经验丰富的舞者，他们动作节奏稳定、步伐有力，承担着节奏引导与动作示范的功能；外围则聚集初学者与临时加入者，通过模仿与观察逐渐融入舞圈。观众通常环绕在更外层，在高潮段落亦可能被吸纳进入。整个空间呈现出“内紧外松”的动态层级结构。

图 4 牟定“三月会”化湖广场左脚舞—云南省第二届民族团结进步大舞台活动现场
（2025 年 4 月 24 日，笔者摄）



这种层级性并不表现为排斥，而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吸纳机制。核心舞者通过身体示范确立技艺权威，外围成员则在重复步伐中获得参与感与归属感。舞圈不断扩展，又在节奏转换时重新收缩，形成稳定而可调节的公共空间结构。

历史上，“三月会”作为大型物资与文化交流集会，为左脚舞提供了持续生成的公共场域。如今，其规模已远超清代“百余人”的场面，往往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盛况。歌声与脚步声交织，持续三日通宵达旦。个体在群体节奏中逐渐隐去差异，身体动作趋于一致，形成一种超越日常社会分隔的公共整合力量。

从空间叙事结构来看，左脚舞通过大型围圈与层级生成机制，构建出一种以公共整合为核心的身体组织模式。空间不再仅是族群内部的情感凝聚，也不仅是开放交往的流动媒介，而是通过规模化的身体协同，完成社区层面的社会联结与公共秩序建构。

（二）动作维度：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

本节聚焦动作语汇、组合逻辑与符号表意，揭示云南彝族舞蹈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探析不同动作体系如何承载文化内涵、传递情感与身份信息，实现身体叙事的功能。

1. 烟盒舞

技巧性模块化动作，表演性符号的跨域传播烟盒舞动作以技巧性、程式化为核心特征，田野中观察到，舞者双手持烟盒弹击发出清脆的“咔咔”声，核心手臂动作“凤点头”（快速转腕弹烟盒）极具辨识度，脚部涵盖蹬步、过堂步、韧步等数十种步伐，且常出现一顺边动作与节拍符点变化，形成独特的舞蹈韵律。其动作组合呈模块化特征，可将“三步弦”“正弦”“杂弦”等核心动作单元自由拆解、拼接，在建水西庄民间展演现场，舞者可根据现场氛围与观众反应即兴调整动作组合，灵活性极强。烟盒舞的服饰道具与动作高度适配，男舞者着双层立领对襟上衣、女舞者着镶银泡坎肩，烟盒从彝族日常生活用具向舞蹈道具的转化，也成为跨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质符号。

2. 阿细跳月

标志性性别化动作，身份性符号的支系表达阿细跳月动作辨识度极高，呈现鲜明的性别化组合特征，田野中弥勒火把节的青年跳月现场，男性舞者以蹬、跳、踢为核心动作，粗犷有力且充满力量感，女性舞者以摆手、转身、扭腰为核心动作，优雅柔和且灵动性强，二者刚柔并济的动作配合与5/4拍节奏精准契合。舞者以胯带动双腿的弹跳动作，极具感染力与爆发力，成为阿细跳月最具标志性的动作特征。阿细跳月因参与者年龄差异形成“青年跳月”“老年跳月”“娃娃跳月”三类，田野中观察到（见表2），老年跳月以舒缓的“摆腿”为主，节奏平缓，娃娃跳月则融入儿歌唱跳形式，动作游戏化特征明显，实现了文化符号的代际传递与活态传承。

表 2 阿细跳月的三种类型

类型	参与主体	节奏特征	基本步伐结构	动作风格	声音/互动符号	队形结构	文化功能指向
青年跳月	青年男女群体	节奏明快、速度快、能量高	“三步乐”（五节拍循环）	动作幅度大、方向转换频繁、跳跃与旋转突出，髋部带动腿部形成快速踏步节律	女性发“噢”音，男性以“噻”音回应；三弦与拍掌形成声一动互动结构	横队、面对面跳跃、半圆、大圈等多种变化	强调活力展示、情感表达与群体交往，是节庆氛围的核心驱动结构
老年跳月	中老年群体	节奏平缓、舒展稳定	“走三步踢两脚”（慢三步乐）	动作自然、松弛，以摆腿为主，允许即兴性动作（提膝、旋转等）	声音互动弱化，重在身体节律与群体同步	以圆形或直线为主，结构相对稳定	强调身体舒适性与群体陪伴功能，体现经验性身体文化与生活化节律
娃娃跳月	儿童群体	节奏轻快，但结构简单	“走三步踢两脚”简化形式	动作轻松、难度低，多为脚底轻触地面，游戏化特征明显	可同步唱儿歌，声音兼具娱乐与学习属性	手拉手、简化圆形结构	具有文化传承与身体习得功能，是族群身体文化的早期教育机制

3. 左脚舞

重复性集体化动作，整合性符号的社区共鸣左脚舞动作以简单、重复、易参与为核心特征，田野中牟定三月会现场，数千名舞者同步完成“三步一跺脚”“踏、搓、跺”等核心动作，无需专业技艺训练，男女老少均可快速参与。其动作组合呈高度统一性，遵循固定的四二拍节奏，无复杂的即兴变化，集体同步的动作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身体共鸣。这种简单重复的动作设计，打破了民族、年龄、身份的隔阂，成为社区内部不同民族实现文化交流、凝聚集体情感的重要身体符号。

4. 小结

综上，三种舞蹈的动作体系分别对应不同的符号类型，结合动作语汇、组合逻辑与意义指向，三种舞蹈的动作体系差异明显，分别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叙事功能，共同呈现了彝族舞蹈身体符号的多元意义生产机制，彰显了身体动作在叙事建构中的核心作用。具体比对如下（见表 3）：

表 3 云南彝族三种代表性舞蹈的身体动作结构与符号意义比较

舞蹈类型	核心动作语汇	动作组合逻辑	符号类型	意义指向
烟盒舞	烟盒开合、弹击， 身体踏、跳、转、翻	模块化组合， 可自由拆解、 拼接，即兴调整	表演符号	技艺展示、 审美表达、 跨地域文化传播
阿细跳月	男性蹬、跳、踢， 女性摆手、 转身、扭腰	性别化组合， 刚柔并济， 布局固定	身份符号	族群标识、 文化记忆、 节庆叙事
左脚舞	三步一跺脚、 踏、搓、跺	统一性、 重复性组合， 节奏同步， 无复杂即兴	整合符号	集体凝聚、 社区认同、 公共情感传递

（三）仪式维度：交融的身份建构

彝族舞蹈的仪式功能各有侧重，在田野实践中通过不同的仪式参与模式，推动族群认同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转化，实现文化交融的叙事目标（见表 4）。

表 4 三种彝族舞蹈的仪式维度与身份建构功能比较

舞蹈类型	节庆关联度	场域分布	参与主体	核心仪式功能
烟盒舞	低（泛仪式化）， 不局限于固定节庆	多元， 涵盖民间展演、 旅游、校园、 日常娱乐	无限制， 跨支系、 跨人群 均可参与	文化交流、 审美传播， 促进跨地域 文化融合
阿细跳月	高（强仪式化）， 与火把节、 密枝林祭祀 深度绑定	单一， 主要为阿细族 聚居区节庆 固定场地	以阿细支系 成员为主， 具有排他性	族群认同、 文化传承， 维系支系边界 与凝聚力
左脚舞	中（公共仪式化）， 关联庙会、 集会等公共事件	公共化， 涵盖庙会、 婚丧嫁娶、 社区集会	无限制， 覆盖社区 全体成员， 全民参与	社会整合、 公共联结， 实现社区 凝聚与稳定

1. 烟盒舞：泛仪式化，跨场景的文化交流烟盒舞的仪式性较弱，呈泛仪式化特征，田野中发现其可灵活进入民间展演、旅游景区展示、群众日常健身等多种场域，打破了传统仪式场域与日常生活场域的边界。在建水县城休闲健身广场，每天清晨都有彝、汉、傣等不同民族的群众跳健身烟盒舞，将传统舞蹈转化为日常身体实践；在石屏、建水等旅游景区，烟盒舞展演成为对外展示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2. 阿细跳月：强仪式化，节庆专属的支系认同阿细跳月仪式性极强，与阿细族火把节、密枝林祭祀等传统祭祀节庆深度绑定，是节庆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田野中弥勒西一镇火把节上，阿细跳月伴随篝火祭祀仪式开展，舞者在舞蹈中融入传统祭祀礼仪，成为传递阿细支系文化记忆、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田野实践中，其仪式边界逐渐开放，在弥勒市民族文化节上，阿细跳月与汉族龙舞、傣族孔雀舞同台展演，实现了仪式场域的跨民族共享与文化交融。

3. 左脚舞：公共仪式化，全民参与的社区交融左脚舞呈公共仪式化特征，主要分布于三月会、庙会、婚丧嫁娶、社区集会等公共民俗场域，田野中牟定县的乡村集会中，左脚舞是必备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主体覆盖社区内所有民族、所有年龄层的群众。在牟定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各族群众通过共跳左脚舞形成“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认同，舞蹈的仪式功能从最初的“彝族族群凝聚”逐步延伸至“多民族社区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化表达。

研究讨论

研究表明，彝族舞蹈的身体并非单纯的动作执行工具，而是承载文化记忆、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的复合符号系统。正如苏珊·朗格（Langer, 1953/1986）所指出，舞蹈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身体动作构成意义生成的核心媒介。本研究在田野中进一步发现，舞蹈的空间组织、动作语汇与仪式结构构成三个相互嵌合的表意层面，共同推动“交往—交流—交融”的递进生成。这种多层次的身体符号结构，与张素琴与刘建（2013）提出的舞蹈身体语言“感知层—形式层—意义层”三层模型形成呼应，说明民族舞蹈的叙事机制具有清晰的符号分层逻辑。

在空间层面，“圆圈”作为核心句法单位，通过圆心指向、圈层流动与跨圈互动，构建出开放而可调节的身体场域。这一空间组织方式可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具象化结构。亨利·列斐伏尔（Lefebvre, 1974/1991）指出，空间并非中性的物理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结果。左脚舞去中心化的围圈结构，将不同民族与年龄的参与者纳入同一节奏秩序；阿细跳月以内外圈层实现内聚与开放的平衡；烟盒舞通过“串花”等动作打破空间边界，使舞蹈场域呈现高度流动性。身体的站位、距离与运动轨迹因此转化为一种交往语言，使“身体相遇”成为多民族互动的起点。这种通过空间结构实现关系重组的过程，体现了舞蹈作为“社会空间实践”的功能。

在动作层面，彝族舞蹈的身体语汇呈现出明显的互嵌特征。烟盒舞“三步弦”吸纳汉族秧歌扭腰元素，阿细跳月的节奏结构融汇多民族音乐因素，道具运用亦体现跨文化借鉴。这种动作模仿与节奏互鉴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转译过程。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1977）在“惯习”理论中指出，身体实践是社会结构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意义再生产的重要方式。通过共舞实践，各族群众在身体层面建立理解路径，实现由“动作交流”向“文化理解”的转化，体现出身体作为社会意义生成机制的能动性。

在仪式层面，彝族舞蹈通过节庆共享、传统再造与身份重构，推动认同结构由支系内部向更广阔的共同体层面延展。维克多·特纳（Turner, 1969）提出，仪式过程能够通过“共同体”的生成，暂时消解社会差异，重构社会关系。火把节、三月会等节庆已成为多民族共在的公共仪式场域，不同民族舞蹈同台展演形成文化共生格局；在互嵌式社区与校园空间中，共跳彝族舞蹈成为情感联结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纽带，使身体实践转化为共同体认同的具身表达。这表明民族舞蹈不仅是文化展演形式，更是一种持续生成社会整合的仪式机制。

由此可见，彝族舞蹈的“三交”叙事并非被动融合的结果，而是在持续的身体实践中生成的意义建构机制。空间组织回应“如何交往”，动作互嵌回应“如何交流”，仪式共享推进“如何交融”，三者层层递进，构成由身体出发、通向文化认同的叙事链条。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将身体符号视为理解民族舞蹈叙事结构的关键入口，并在身体符号学、空间生产理论与仪式理论的交叉视域下，揭示民族舞蹈如何通过具身实践生成社会关系与认同结构。在实践层面，应在守护核心动作结构与符号内核的前提下，鼓励跨民族语汇互鉴，使民族舞蹈在当代社会中持续发挥连接差异、凝聚认同的文化功能。未来研究可拓展比较视野，将彝族舞蹈与云南其他民族舞蹈的互动形态纳入分析，并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开展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对民族社会整合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 Bai Ling 白凌. (2011). 舞蹈叙事功能及其实现的途径与方法.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4), 29-33.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Haiqi 常海齐. (2019). 达斡尔民族影像的文化符号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Dai Linna 代琳娜 & Yang Fuwang 杨甫旺. (2014).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以两姚彝族葫芦笙制作为例. 毕节学院学报, 32(5), 46-51.
- Feng Li 冯莉. (2021). “尚武”传统与身体表达——以纳西族仪式舞蹈为例. 民族艺术研究, 34(4), 127-135.
<https://doi.org/10.14003/j.cnki.mzsysj.2021.04.15>
- Gao Yunpeng 高云鹏. (2021). 凉山彝族舞蹈文化特征探析. 四川戏剧, (8), 115-118.
- Gu Peiying 顾佩英. (2025). 舞蹈意象叙事的转化路径与当代实践——以《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为例.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5), 98-104.
- He Fangzhou 何放舟. (2016). 舞蹈作品的叙事性结构.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1), 13-16.
- He Yanshan 何艳珊 & Yang Shilei 杨石磊. (2022). 天人感通：汉代舞蹈身体叙事中的美学隐喻. 乐府学, (1), 197-211.
- Jia Jia 贾佳. (2025). 古典舞表演中的文化符号与身体语言交融. 文化学刊, (12), 167-170.
- Langer, S. K. (1986). *Feeling and form: A theory of art developed from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 Li Guozhong 李国忠 & He Chunyun 和春云. (2019). 纳西族摩梭达巴舞蹈的原始身体动作文化符号解析. 文化学刊, (10), 39-41.
- Li Yanhao 李延浩 & Cui Hang 崔航. (2020). 我国民间民俗舞蹈的现实简化及趋向——以四川大凉山彝族祭祀民俗舞蹈等为例.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3(1), 119-122.
- Li Jiani 李佳霓. (2025). 央视春晚语境下非遗舞蹈的身体叙事与记忆建构.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34(2), 21-26.
- Liu Jian 刘建. (2017). 替代的焦虑——作为身体文化符号的中国古典舞刍议. 艺术广角, (01), 87-91.
- Liu Xujia 刘旭嘉. (2024). 舞蹈表演中身体语言符号化探析.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https://doi.org/10.27408/d.cnki.gxmzc.2024.000193>
- Liu Ye 刘晔. (2011). “火”象征的彝族舞蹈文化论析.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7(1), 60-63.
- Liu Lian 刘炼 & Liu Lu 刘璐. (2014). 有意味的形式——走出舞蹈拙于叙事的藩篱. 文艺争鸣, (3), 233-240.
- Long Luogui 龙保贵. (2023). 滇南彝族乐作舞类型与要素及其文化意蕴与风格动律.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41(1), 26-33.
-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Gallimard.
- Pu Lichun 普丽春. (2001). 彝族舞蹈“阿细跳月”的文化特征浅析. 思想战线, (2), 62-64.
- Peng Jing 彭晶. (2025). 观演互构：舞蹈表演中美育发生的核心机制研究. 尚舞, (19), 84-86.
- Pu Yongguan 朴永光. (2004). 凉山彝族丧事舞蹈研究. 民族艺术, (1), 56-63.
<https://doi.org/10.16564/j.cnki.1003-2568.2004.01.006>

- Sun Dechao 孙德朝. (2022). 彝族蹓脚舞的身体符号及文化记忆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48(4), 63-70.
<https://doi.org/10.15942/j.jcsu.2022.04.014>
-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Aldine.
- Wang Kai 王恺 & Ma Xuan 马璇. (2020). 叙事舞蹈作品的队形研究. 四川戏剧, (3), 152-155.
- Wu Tong 吴桐. (2025). 舞蹈符号文本的认知机制: 身体、器物与场域的意义生成. 认知诗学, (2), 217-227.
- Xu Wei 许薇 & Jin Miao 金淼. (2025). 历史记忆的视觉生成.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 120-123.
- Yang Xiangdong 杨向东 & Feng Chuyin 冯楚吟. (2017). 原始图腾崇拜视角下的舞蹈遗存例证. 四川戏剧, (9), 117-120.
- Yang Xiangdong 杨向东 & Yuan Lingyun 袁凌云. (2015). 凉山彝族舞蹈的嬗变与创新. 贵州民族研究, 36(9), 68-71. <https://doi.org/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5.09.017>
- Yang Yang 杨洋. (2025). 民族舞蹈中的符号语言与身体叙事. 明日风尚, (14), 31-33.
- Yang Chen 杨琛. (2020). 云南特色簧管乐器的制作工艺与舞蹈音乐形态研究.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 67-86.
- Yu Ping 于平. (1995). 论舞蹈叙事的线性结构方式. 舞蹈, (5), 45-46.
- Zeng Shuangshuang 曾爽爽. (2018). 审美视角下彝族舞蹈动作的魅力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 39(12), 109-112.
<https://doi.org/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8.12.023>
- Zhang Jiaxuan 张嘉烜. (2014). 台湾地区阿美族舞蹈传统与创新.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4), 86-89.
- Zhang Suqin 张素琴 & Liu Jian 刘建. (2013). 舞蹈身体语言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Zhang Suqin 张素琴. (2010). 论舞蹈调度的构成法则与叙事表达.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1), 11-14.
- Zhang Song 张松. (2020). 凉山彝族舞蹈动律特点及成因探微. 四川戏剧, (12), 139-141.
- Zhang Fulin 张富林. (2017). 红河县垭施村彝族“乐作舞”辨误.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5), 61-65.
- Zhao Qian 赵倩. (2017). 巫术仪式中的舞蹈艺术传承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 38(8), 112-115.
- Zhu Yuhong 朱玉红. (2020). 论叙事性舞蹈编创的原则. 文艺争鸣, (11), 201-203.
- Zhu Qiutao 朱秋涛 & Tian Yan 田艳. (2025). 梅山仪式雉舞的身体符号与文化属性.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4), 167-172.
- Zong Mingli 宗明立. (2016). 舞蹈身体语言的语义与语义思维研究. 南昌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Zhao Ming 赵明 & Liu Yi 刘怡. (2013). 当代凉山彝族舞蹈的现代性嬗变与创新. 文艺争鸣, (11), 148-152.
- Zhonghua Wudaozhi Bianji Weiyuanhui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2007). 中华舞蹈志: 云南卷. 学林出版社.